



经山东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 2003 年审查通过(试用)
山东省地方课程学习指导书 · 民族文化领域

齐鲁文化

教师教学参考用书

初中二年级（八年级）

◆ 周原 编著

齐鲁书社

经山东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3年审查通过(试用)
山东省地方课程学习指导书·民族文化领域

齐鲁文化

教师教学参考用书

初中二年级(八年级)

◆周原编著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齐鲁文化(教师教学参考用书)/周原编著.—济南:齐鲁书社,2004.6
ISBN 7-5333-1340-2

I. 齐... II. 周... III. 文化史—山东省—初中—
教学参考资料 IV. G633.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2782 号

齐 鲁 文 化 (初中二年级<八年级>/ 教师教学参考用书)
周 原 编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E-mail qlss@sdpress.com.cn
印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mm 1/16
印张 13.25
字数 280 千
版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33-1340-2/K·384
定 价 20.00 元

目 录

第一单元 历史渊源

第1课 从“夷”、“东夷”说起	(2)
第2课 黄金时代.....	(6)
第3课 融合与发展.....	(8)
第4课 尚武重文的传统	(13)
第5课 我心目中的“齐鲁十二圣贤” ——活动与探究(一)	(17)

第二单元 学术大观

第6课 儒家思想	(20)
第7课 墨家理论	(36)
第8课 兵家文化	(43)
第9课 管晏学说与稷下学派	(51)
第10课 历史短剧:百家争鸣 ——活动与探究(二).....	(60)

第三单元 科技举要

第11课 天文与地理.....	(63)
第12课 农学与手工业.....	(68)
第13课 医学.....	(75)
第14课 丝绸之路源头在哪里 ——活动与探究(三).....	(81)

第四单元 文学与艺术

第15课 诗歌.....	(84)
第16课 散文与小说	(101)
第17课 书画艺术	(109)
第18课 曲苑杂坛	(116)
第19课 填词联句小游戏 ——活动与探究(四)	(121)

第五单元 海岱文明与宗教民俗

第20课 海的遐想	(124)
第21课 泰山崇拜	(129)

第 22 课 泛神崇拜	(142)
第 23 课 佛教与道教	(145)
第 24 课 齐鲁民俗	(150)
第 25 课 民俗故事会 ——活动与探究(五)	(156)
第六单元 文物与古迹	
第 26 课 齐长城	(159)
第 27 课 古墓探秘	(164)
第 28 课 碑林刻石	(170)
第 29 课 寺庙道观	(174)
第 30 课 探寻家乡的历史文化遗存 ——活动与探究(六)	(178)
第七单元 商业与漕运	
第 31 课 重商传统	(183)
第 32 课 运河文化	(188)
第 33 课 模拟畅游大运河 ——活动与探究(七)	(191)
第八单元 齐鲁文化在海外	
第 34 课 儒家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194)
第 35 课 跨越时空的《孙子兵法》	(199)
第 36 课 “海外齐鲁文化花絮”展览 ——活动与探究(八)	(203)
主要参考书目	(205)

第一单元 历史渊源

山东省，简称“鲁”，也称“齐鲁”。因为齐、鲁两国是西周在今山东地区建立的两个最大的封国，对后世影响很大，所以被作为山东省的代称。“山东”一名，在历史上所指的地域范围变化较大，到宋元时期今山东地区才成为行政区划，清代才正式命名为山东省。由于山东地区文化圈的形成是在齐、鲁两国时代，而在山东成为行政区划以后，所以称“齐鲁文化”而不称“山东文化”。“齐鲁文化”这一称呼可以代表山东文化，但比“山东文化”有更丰富深远的历史蕴涵。

齐鲁文化是怎样形成的？发展过程如何？有哪些基本特点？本单元将简要解答这些问题，旨在对齐鲁文化先有一个宏观的认识。

第1课 从“夷”、“东夷”说起

文化问题，首先是一个历史问题。历史的创造主体是人。我们已经知道，元谋猿人、北京猿人是我国远古早期的人类，那么考古发掘最早的山东人在哪里？

沂源人 1981年，在山东沂源县土门乡骑子鞍山的一个石灰岩裂隙中，发现了距今四五十万年的猿人化石，计有：头盖骨一块，股骨、肋骨各一块，眉骨两块，牙齿二枚；次年又发现了两枚牙齿。考古学家推断可能是两个成年人的骨骼，属于猿人或直立人晚期阶段。按照考古学的习惯，称之为“沂源人”。

沂源人与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大约是同时代人。分析眉骨的粗壮程度和牙齿的原始性质，体质特征也与北京猿人极为相似。就目前发现的考古资料来说，沂源人应是最早的山东人。

但是，沂源人只是考古学的称谓，历史文献对山东土著先民的统称则是“东夷”，东夷人是齐鲁文化的开创者。

夷与东夷 远古时代的山东居民，称为“夷”。“夷”最初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和现代汉语的“人”本为一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写为“”，与“人”字相近而混用；由于地方语音不同，西方念“人”，东方念“夷”（至今胶东方言仍保留着这种古老的语音）。汉代学者许慎的《说文解字》从字形上解释，说夷字由“大”（正面的“人”的象形字），“弓”组成，表示身材高大、善使弓箭。而山东出土的箭镞和古代“后羿射日”的神话传说也证明夷人善射，考古发掘也证明山东大汶口人男子平均身高172.26厘米，比创造仰韶文化的中原人高出3~4厘米。这样说来，山东人至今号称“山东大汉”，身高体大也许与夷人遗传有关。

夷人居住在中国东部，后来中原地区华夏族从地域出发，称夷人为“东夷”。“东夷”作为专称，首见于《礼记·曲礼下》：“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东夷”成为专称之后，“夷”的概念随着发生变化，泛指中原以外的周边部族，后来又用来指称外国——例如清代思想家、史学家魏源，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的主张。

东夷人是一个很大的族团，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较多，《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东夷人分布范围也很广，但山东是其大本营。考古发现的东夷文化的类型，主要有四种：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

北辛文化 是母系氏族公社的兴盛时期，是目前已发现的山东最早的新石器文化。1964年，滕州市官桥镇北辛村发现了古人类遗址，按照考古学惯例，以遗址命名某种文化类型，于是称为“北辛文化”。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2米左右，北临薛河故道。

大汶口文化 以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命名。自 1959 年起发掘清理，出土了大批器物，确立了这一文化类型。分布范围主要在齐鲁区域，以陶器为主要特征，在陶器制作方面，已由手制发展到轮制。距今约四五千年，文化层堆积很厚，早、中、晚三期上下 1600 余年。泰安大汶口遗址总面积 82 万余平方米，是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遗存。

龙山文化 因 1928 年首次发现于山东济南市章丘龙山镇而得名。年代约在公元前 2400 年至公元前 1900 年间，分布范围与大汶口文化大体一致，是大汶口文化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最有特色的一种陶系是蛋壳黑陶，泥质细腻，质地坚硬，薄如纸，明如镜，黑如漆。

岳石文化 因 1960 年发现于山东平度东岳石村遗址而得名，时代大致相当于夏代与商朝早期，分布中心在胶东半岛，器物群以红陶、灰陶为主。

东夷在发展进程中，出现了许多部落联盟首领，他们的事迹大都以神话传说的形式流传下来，比较可靠的是少昊、蚩尤、舜。

少昊 东夷人的祖先之一，活动中心在今山东曲阜。传说少昊的后裔国家有近百个，主要活动在齐鲁区域内。例如郯(tán)国，就在今山东郯城县。《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国人以少昊为祖先，说少昊名字叫“挚”（与“鸷”通，即鸷鸟，属鹰类），“以鸟命官”，揭示了原始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而这种记载已为考古所证实：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仿鸟形陶器、玉器，以及许多鸟形纹饰，证明少昊以鸟为图腾是真实可靠的历史事实，也可以证明东夷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以鸟为图腾，东夷人是鸟图腾崇拜的大本营。

“图腾”一词是英文“totem”的翻译，清代学者严复于 1903 年译英国学者甄克思的《社会通诠》一书时作此翻译，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通用译名。图腾的词义是“他的亲族”，远古时代的人认为，每个氏族，都与某一类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事物有着亲缘的或特殊的关系，并把它们视为祖先、象征或保护神，加以崇拜，这就是图腾崇拜。

蚩尤 中国历史上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关于其族属，学术界至今尚无一致意见，或以为系苗蛮部落的领袖，或以为属于东夷集团，甚至认为属于华夏集团乃至太昊地区的良渚文化部族。但《逸周书·尝麦解》记载蚩尤居住在原先少昊活动的地区，是东夷人的首领，这当最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蚩尤与以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夷夏东西大会合之际，龙图腾集团的黄帝部落和鸟图腾集团的东夷部落，发生了冲突与融合。

舜 又称虞舜、帝舜、大舜，关于其籍贯，历来众说纷纭，但孟子认为是“东夷之人”（《孟子·离娄》）。袁珂先生根据古籍中有关舜的资料，编著《古神话选释》，可以参看。徐北文先生著《大舜行迹考》，认为：“大舜生于诸冯：今山东省诸城市。耕于历山：今山东省济南市之历城区。渔于雷泽：今山东省菏泽市东北。陶于河滨：今山东西北与河南东部一带古黄河处。作什器于寿丘：今山东省定陶西北。灰（贩）于常阳：今山东省鄄城县。迁于负夏（尧得之于逢泽之阳）：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北。卒于鸣条（葬于南己）：在今鲁豫皖三地之间。他是从东部逐步向西部迁徙的。”

考察史前文化，主要依靠考古，同时运用文献材料去论证神话传说和习俗崇拜等等。从

考古和文献资料两方面来看,东夷人创造了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齐鲁文化的远源。

夏朝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史前文化的终结和早期国家的产生。随后的商、周二朝,是民族和文化的大融合时期,殷商文化、周文化都是齐鲁文化的重要渊源。

殷商文化 商是黄河下游的一个古老部落,与东夷有族源关系。《诗经·商颂》有一篇歌颂商祖先的史诗性乐歌,叫《玄鸟》,开头就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意思是说,上天命令燕子降临人间,生了商朝的始祖契(xié)。“玄”是黑色,燕子是黑色的,所以叫“玄鸟”。这说明商以鸟为图腾,属东夷部落。商人曾在泰山附近建立东都,向东扩展势力,一直发展到海边。他们有一个首领叫王亥,相传他善于驯养牛,经常用牛驮着物品和东夷各部落进行贸易交换,各部落都知道他是商族人,便称他为商人。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我国把做生意的人叫做“商人”,就来源于商族王亥驯牛经商的故事。后来齐国人善于经商,当受商族的影响。

商汤灭夏建商,从汤到盘庚,十代二十王,共迁都五次,其中三次都定都在今山东境内。特别是奄(今山东曲阜),更长期是商朝的政治、经济中心,后来成为鲁国的都城。在商人创业和守业的过程中,殷商文化深深地影响了齐鲁文化。

周文化 周国发迹于陕西渭水流域,东征灭商,建立周朝。通过东征和建立齐、鲁两个大国,周文化成为齐鲁文化的又一源头,而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鲁文化的影响尤为深刻。周人起于西部,是典型的农耕文化,与东夷人缺乏地域、血缘和历史的联系,早先和东方沿海部族几乎没有来往,后来和商朝接触也集中在西部。周灭商统一天下后,亟须解决东部民族问题。为此,封开国元勋姜太公为齐侯,周公的儿子伯禽为鲁侯。齐鲁两国作为周朝在东方的屏障,自然要执行周朝的政治策略和文化传统。伯禽在鲁国沿用周礼,大力推行宗法制,使鲁人对周礼别有深情,“先君周公制周礼”几乎是历代鲁君的口头禅。文化积淀的结果,培育出了注重礼乐的儒家始祖孔子。孔子非常推崇周和周文化,认为自己继承了周文化(《论语·子罕》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名言摘录

孔子尊周言论摘抄

周监(借鉴)于二代,郁郁(丰富多彩)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

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泰伯》

周有大赉(lài,赏赐),善人是富。——《尧曰》

从周武王伐纣(前1027)到周平王东迁(前770),这一时期前后约近三百年,政治、经济制度变化很大,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齐鲁文化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最后的酝酿,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特点。

成语典故

天河洗兵

《说苑·权谋》记载：周武王出兵伐纣时，天气晴朗却大雨滂沱。散宜生谏阻说：“这是不是妖孽啊？上天不让我们伐纣吧？”周武王说：“不对，这是上天为我们洗刷兵器。”于是果断进兵，消灭了殷纣王。后人遂用“天河洗兵”、“洗甲天河”、“洗兵雨”表示战争胜利和结束。

总之，东夷文化、殷商文化和周文化，在长期相互影响、交流、融合的过程中，慢慢孕育出了齐鲁两国的文化，它们是齐鲁文化的三大来源。周文化占有主导地位，重在社会上层建筑方面；东夷文化和殷商文化处于次要地位，主要影响民间的习俗、道德等等。

第二章 黄金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化勃兴，齐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站在了那个时代的顶峰。

齐鲁立政方针 齐、鲁建国，都担负着共同的重任：镇抚东方，保护周朝。但它们的政治方针，却有较大差异。

齐国姜太公的施政方针是：“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前两句是文化政策——尊重东夷人的传统习惯，简化繁琐的礼仪；后两句是经济政策——因地制宜，繁荣地方经济。在使用人才上，姜太公的态度是“举贤上功”，任人唯贤，崇尚功业。这一方针重视经济建设，灵活、开放、务实，比较开明。在实行中也很见成效，齐国很快就稳定下来，姜太公到任五个月后便西行回到王室去汇报政绩了。

鲁国伯禽采取的是相反的方针：“变其俗，革其礼。”（《史记·鲁周世家》）在使用人才上，“尊尊而亲亲”（《汉书·地理志》），意思是：尊敬地位崇高的宗室宗人，信任自己的血缘亲族。文化政策上的强硬激进，用人路线上的任人唯亲，使伯禽在鲁国执政相当艰难，上任三年之后，才能回到王室述职。父亲周公听了他的汇报后，觉得伯禽的做法不大切合实际，感叹鲁国以后要落后于齐国。

周公的感叹果然成为事实：齐国迅速走上了民富国强的道路，成为春秋第一个称霸的大国，战国时仍为七雄之一；而鲁国由等次居于首位的“望国”逐渐衰落为二流小国。

立政方针的不同，导致齐鲁两国文化上出现差异。最大的差异是：齐国崇尚功利，鲁国重视礼乐。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鲁国地近泰山，其文化好比“仁者”，坚毅、稳重；齐国濒临河海，其文化好比“智者”，开放、灵活。

齐国文化的开放、灵活，决定了它的文化向多样性发展：管子、晏子的学说有杂家倾向，兵家文化别有天地，稷下学宫百家争鸣。齐桓公之所以能开创霸业，其中一个原因是他首倡“尊王攘夷”的政治口号，这个口号实际上是深层次的文化策略。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地位虽日趋衰微，但名义上仍是诸侯的共主，齐桓公为了在诸侯中树立威信，获得“合法”权和领导权，首先以“尊王室”、“攘夷狄”相号召，意谓尊崇王室，排斥周边少数民族。汉代以后，这种思想经过发挥，影响很大，每当汉族政权受到异族威胁时，当政者就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动员民众团结抗敌。齐桓公喊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这同时也表明：经过数百年的磨合、渗透，殷商文化、东夷文化已经与周文化融为一体，东夷地区已不再是“夷”，而是华夏族的一员了。

鲁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虽不如齐国，但对周礼的恪守，却使它成为东方各国的文化中心。《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国的执政韩宣子于公元前540年出使鲁国，“观书于太史氏”，

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孔子、墨子出现在鲁国，就是其丰厚文化的积淀结果。

儒墨显学与稷下学宫 战国末期的思想家韩非，写有一篇《显学》，论述春秋战国的学术发展，认为当时最著名的学派是儒家、墨家。

儒、墨显学，标志着鲁国形成了强大的文化中心。而齐国的文化中心，则形成于战国中后期的稷下学宫。

齐国的都城最初在营丘（今淄博临淄北，一说在今昌乐东南），公元前9世纪初叶，齐哀公迁都临淄。临淄城的西门叫稷门，稷门附近称为稷下，齐国在此建立学宫，称稷下学宫。稷下学宫既是齐国文化传统弘扬和演进的产物，还与“田氏代齐”有较大的关系。姜太公始封齐国，所以齐国国君姓姜。到春秋晚期，由陈国迁居齐国的田氏，势力逐渐强大，开始控制齐国政局。公元前481年，田常杀齐简公姜壬，独揽大权。公元前386年，田和得到周王室的正式承认，列为诸侯，仍沿用齐国国名，史称“田氏代齐”。田氏初立，亟须招揽天下贤士，广开言路，获得他们的帮助。稷下学宫的大发展是在齐威王的统治时期，而这位齐威王，就是“邹忌讽齐王纳谏”（《战国策·齐策》）故事中的那位齐王，名叫田因齐。

齐国给稷下学者以崇高的社会地位、丰足的生活待遇，允许他们来去自由，在学术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地位尊隆，待遇优厚，学术自由，这些优越的条件吸引四面八方的学者纷纷前来，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昌盛局面。

历时150年之久的稷下学宫，是文化史、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它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产生的有组织、有聘任、有俸禄的综合性研究院·议政治学，招徒授业，培养人才，既是社会科学院，又是议政咨询机构，也是高等学府，具有多重性质、多重职能。

思想大解放，学术大繁荣，以儒墨显学和稷下学宫为标志，齐鲁文化达到了黄金时代，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 3 融合与发展

齐文化和鲁文化尽管有一定的差异，但毕竟有相同的历史渊源，两国疆界邻接，交往频繁，文化联系日益密切，不断交流、渗透、融合，形成富有地域特色的齐鲁文化圈。特别是战国时期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文化学术在争鸣中发展，在争鸣中相互吸收、融合。

战国末年，剧烈凶猛的军事暴力，使得政治和疆域已大大先于文化走向了统一。公元前249年，楚国灭鲁，鲁顷公逃亡国外，死于齐国。公元前221年，秦国灭掉最后的诸侯国齐国，统一天下，建立秦朝。

大一统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建立，本应为文化融合带来机遇，但秦朝的文化选择出现重大失误，错失良机。

秦朝的文化选择

秦国的君主姓嬴，其族源本属东夷，是少昊的后裔。后来离开东方的家园，辗转迁徙，到周孝王（前885～前870在位）时定居于西北地区。艰苦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坚韧勇悍的性格，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精神：重武力，重功利，轻文化，轻伦理。商鞅变法固然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但是也加重了秦国原本就有的文化缺陷。商鞅变法的实质是走军国主义的强国之路，其核心内容是两个：一是奖励耕战，二是以严酷的刑罚禁锢思想、窒息文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商鞅甚至明确提出要“燔诗书”，实际上开启了“焚书坑儒”的先例。对于“耕战”，尤其是“耕”，也要具体分析。商鞅奖励农耕，刺激垦荒，滥垦的农田产量很低，只好扩大垦田面积，如此恶性循环，导致毁林滥垦，破坏了森林、草原及其他植被，造成生态平衡的失控、自然环境的恶化，加剧了水土流失。例如，泾水原本是相当清澈的一条河流，战国后期变得混浊，而这正是秦国疆土达到泾河上游的时候。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证明，黄河原来并不“黄”，到西汉初年才有了“黄河”的名称，这显然与秦人大量毁林垦田、破坏黄土高原有关。所以，商鞅变法的强国，是以破坏环境、毁弃文化为代价的。

而在同一时期，齐鲁儒家却主张“罟罟（细密的鱼网）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孟子·梁惠王上》），注重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二者相比，优劣自明。所以，对商鞅变法，要肯定其历史作用，但也要看到它的弊端，尤其是它的文化专制政策和环境破坏政策。

秦王嬴政初期，相国吕不韦执政，组织学者编写了《吕氏春秋》，试图融会诸子百家学说，改变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的一直奉行的法家思想，改变褊狭、极端的文化专制政策，为即将到来的大一统帝国构建一个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思想文化体系。但是秦王嬴政亲政后，吕不韦被杀，调整文化政策的计划随之夭折。后来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来到秦国，推销更极端的法、术、势理论，秦王热衷于他的学说。这种崇拜强权、张扬武力的政治学说，在扫灭六国的

战争中确实很有功效,但在统一之后,不宜继续执行。可是秦朝没有调整策略,仍然滥用强权而不讲求人际关系的和谐,迷信暴力、刑罚而不重视文化的缓和缓冲作用,直至发展到“焚书坑儒”,使文化遭受空前浩劫。唐代诗人章碣的诗作《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颇能代表历代知识分子对秦朝毁灭文化的暴行的嘲讽和痛恨。

秦朝迅速灭亡,原因固然很多,但错误的文化抉择无疑是重要因素。陈胜揭竿而起后,孔子的八世孙孔鲋,率领鲁国的一些儒生携带礼器投奔陈胜,加入“伐无道,诛暴秦”(《史记·陈涉世家》)的行列,战斗至死。高压政策不能解决文化观念领域里的复杂问题,鲁国儒生踊跃反秦,即深含着文化、心理方面的对立。

汉代的文化统一和儒学独尊 在汉朝初年的政治语汇中,“过秦”和“拨乱反正”这两个语汇是最值得注意的。所谓“过秦”,即秦朝的过失,强大的秦朝为什么短期内就土崩瓦解了?统治者和思想家都首先在思考这个问题,其中以贾谊的《过秦论》分析得最为透彻,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曾大段大段地引录《过秦论》,并赞叹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所谓“拨乱反正”,即要消除秦朝的弊政,回到正常的政治轨道上来,谋求长治久安。《汉书·礼乐志》即写道:“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

“过秦”和“拨乱反正”,重要的任务是除秦之弊,建立有利于稳定的文化体系。这是一项艰苦的探索,尽管大批文人学士纷纷献计献策,但汉初的统治集团仍理不出明晰的思路,拿不出鲜明的对策。所谓汉初奉行“黄老学说”的“无为而治”,所谓的“萧(何)规曹(参)随”,实际上是一种等待和观察,一种想不出办法就暂时不拿办法的办法。

但这却不失为明智的办法,它保证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实现了人心民心的稳定,巩固了刘氏王朝的统治,迎来了“文景之治”的安定和富裕。在这个过程中,遭受暴秦打击最严重的儒学,也逐步恢复生机,迅速发展、传播。齐鲁地区是儒学复兴的中心,人才济济,大师辈出——到汉武帝时,五经七家八位大师,除韩婴、董仲舒外,其他都是齐鲁儒生。

资料链接

博士·伏生传经

博士是古代学官名,取博通古今之义。战国诸侯国设有此官,秦朝沿用。汉朝立博士官,掌管教学、课试或奉使、议政。

伏生,一说其名为胜,济南人。曾做过秦的博士,后离开关中,回济南隐居,收藏、教授儒家经典。汉朝复兴儒学,听说伏生精通《尚书》,但其时伏生已九十多岁,不能到京城长安。汉文帝派太常(官名,掌管礼仪、文教)晁错到济南伏生家中学习。伏生年老口齿不清,由女儿义娥代为解说。尽管晁错听不大懂义娥的济南方言,但总算用今文(汉代通行的隶书)记录下来了,整理为28篇,就是传世的《尚书》。

但是,无为政治终究无法解决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它的放任和简约在本质上是与专制政治不相容的,因此只能在特定条件下发挥作用,却不能长期存在于封建专制制

度下。随着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基，黄老学说迅速退隐，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术的本质是一种以人际关系思想的成熟与发达为基础的“群体本位”文化，它注重妥善处理群体和个体的关系，力图构建和谐的社会伦理结构，是一种符合大一统政治需要的文化体系。

秦始皇、汉武帝是中国叱咤风云的两个皇帝。秦始皇高扬武力统一天下，开疆拓土，建立了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汉武帝也实行强权政治，对外大举用兵，但他构筑了一个符合国情的大一统文化体系，解决了民族在意识形态上的认同问题，使国家在稳定的前提下发展。所以比较来看，汉武帝的功绩要比秦始皇大。

汉代是中华民族形成共同文化模式的关键时期，儒学独尊的文化体系用统一的道德伦理、行为模式规范社会成员，有利于促进各地域文化的融合，消除各地域之间人民的心理障碍、文化隔膜，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齐鲁文化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真正的融合，汇入了中华文化，并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从此，作为地域文化，它失去了先秦时期的领先地位和中心地位，没有了独立发达的学术体系，但作为全国整体的一个局部，仍保留一定的地方特色，继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齐鲁文化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是专指先秦齐、鲁两国的文化，是两国文化的合称；广义是指从古到今的山东文化。

汉代以后到近现代，齐鲁文化的进程大约可分为四个阶段：魏晋时期，隋唐时期，宋元明时期，清代。

魏晋时期的哲学和文学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儒学独尊，但也并不完全排斥其他学说，道家、佛教也占有很大的比重。

资料链接

“玄”与道家

《老子》说“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妙”一词即源于此），后人便常用“玄”代指道家。谈论老庄思想的学术叫“玄学”，“玄宫”、“玄寺”、“玄坛”指道庙、道观、道场，“玄蕴”、“玄言”、“玄书”、“玄籍”指道家书籍，“玄科”指道教的规章，“玄言诗”指用老庄言词写的诗。

道家学说始创于老子、庄子，兴盛于魏晋时期。魏晋时期兴起以老、庄思想为主的一种哲学思潮，叫“玄学”。玄学的代表人物，是山阳高平（今金乡县西北）人王弼。王弼（226～249）24岁的短暂生命，却写下了《老子注》、《周易注》、《论语释疑》等多种著作，是玄学理论的奠基人。他的哲学纲领是“贵无论”，力倡“无为而治”，主张以不变应万变，以静制动。

成语典故

无中生有

“无”是道家的哲学概念，指虚无。《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王弼把它发挥成本体论世界观，把“无”当作世界的本源，“有”（各种各样的物质形态）是从“无”中产生的。于是“无中生有”便成为道家术语。后来使用范围扩大，词义变迁，指凭空捏造。

南朝刘宋时期的何承天(370~447),东海郯(今郯城)人,是一位天文学家,也是思想家,著有《报应问》、《达性论》,宣扬无神论,批判佛教的神不灭论。

北朝颜之推(531~591),琅琊临沂(今临沂)人,著《颜氏家训》,阐发儒家的人生观与伦理思想,首开“家训”著述的先例,对后世影响很大。

名言摘录

《颜氏家训·勉学》摘抄

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个人也。

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立行,秋实也。

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收敛。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地区的文学要比哲学影响大。建安文学,曹氏父子的主要文学活动在山东,建安七子中有四人出自山东。临淄人左思文笔矫健,是西晋年间最杰出的诗人。东海郯人鲍照,擅长七言和杂言乐府诗,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东莞莒(今莒县)人刘勰,撰写了我国第一部文论专著《文心雕龙》,把文学批评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峰。

隋唐时期的艺术和哲学 隋末,山东战乱严重,经济凋敝,文人学士流寓他乡,文化

力量大为衰减。唐朝文化昌盛,诗歌辉煌,但山东的著名诗人却很少;特别是安史之乱后,来自高丽(今朝鲜)、文化落后的李氏家族割据山东,战火不休,文化遭受摧残。纵横对比来看,这一时期齐鲁文化处于低潮。成就突出的是书法艺术和石窟艺术。祖籍琅琊的颜真卿创造的“颜体”楷书,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济南柳埠千佛崖、青州驼山与云门山的石窟造像,都是珍贵的艺术宝库。

唐代山东最著名的哲学家是吕才(600~656),博州青平(今临清)人。他博学多才,涉猎范围很广,最主要的贡献是无神论思想和对宿命论、风水迷信的批判。

宋明时期的理学 齐鲁文化自宋初开始逐渐复兴,与全国文化同步发展,特别是文学

(第四单元将专门介绍)甚至居领先地位。在理学方面,山东是发源地之一,出现了一些学者。

原籍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的孙复(992~1057),长期隐居泰山,著述讲学,开创了闻名全国的新儒家学派——泰山学派,是理学的先驱。

兗州奉符(今泰安)人石介(1005~1045),曾拜孙复、范仲淹(少年时在山东长期居住,晚年曾任青州)为师,与欧阳修等人为友,建立泰山书院,以排斥佛道、尊崇儒学、安定天下为己任,开理学先声。

明代理学在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又派生出王守仁的心学体系,堂邑(今属聊城)人穆孔晖(1479~1539)率先在山东传播王守仁的“良知学说”。此外,在平阴张后觉(1503~1578)、孟秋(1525~1589)也是王氏心学在山东最重要的传播者。

清代山东的朴学

朴学，本指上古质朴的学问，后来泛指儒家经学。清代，特别是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学者继承汉儒的学风，以考据训诂的方式研究经籍，称“朴学”或“汉学”，这类学者叫“乾嘉学派”。朴学的创始者顾炎武，曾长期在山东居住，考察游历齐鲁山川，对山东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终清一朝，齐鲁学术以朴学成就最高，学者辈出。

张尔岐(1612~1678)，字稷若，济阳人。他是明末清初理学向朴学过渡的代表人物，研究《仪礼》，著《仪礼郑注句读》一书。顾炎武称赞这部书“根本先儒，立言简当”(《答汪苕文书》)。

马骕(sù，1620~1673)，字宛斯，邹平人。编撰《绎史》，著录上古到秦末的历史，给后世学者研究先秦历史提供了便利。

孔广森(1751~1786)，子众仲，曲阜人，孔子六十八代孙。精研“三礼”和“公羊春秋学”，是乾嘉学派的重要学者。

周永年(1730~1791)，字书昌，济南历城人。参与《四库全书》编写，深受总编纂纪晓岚的赏识。又是一位藏书家，曾在济南五龙潭畔建立公共图书馆的雏形“借书园”，收集书籍供学者公开借阅。

桂馥(1736~1805)，字冬卉，号未谷，曲阜人。潜心研究文字学，费时四十余年写成《说文义证》，为后世研究《说文》的必读书。

郝懿行(1755~1823)，字恂九，号兰皋，栖霞人。著述丰饶，《尔雅义疏》、《山海经笺疏》是他的两大力作。

王筠(1784~1854)，字贯山，号慕友，安丘人。文字学家，吸收前人研究《说文解字》的成果，独辟门径，著《说文句读》、《说文释例》，多有发明。

马国翰(1794~1857)，字词溪，号竹吾，祖籍济南章丘，迁居历城权府庄。花费毕生精力从事书籍辑佚，收集书籍达五万七千多卷，编成《玉函山房辑佚书》，对隋唐以前的散佚典籍作了系统调查和整理，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文献巨著。

王懿荣(1845~1900)，字廉生，福山人。金石文字学家，甲骨文的发现者。他在北京任京师团练大臣时，煎药发现一种叫“龙骨”(古代脊椎动物骨骼和牙齿的化石)的中药上，有类似于篆文的字样，于是把北京宣武门外“达仁堂”药铺贮存的“龙骨”全部买下，经过观察研究，认定是古代的一种文字。从此开始高价向古董商收购，搜集甲骨原片一千多件，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于是才有了殷墟甲骨文的发现。